

试析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

□ 兰台世界杂志社 杨宗鸣

一、序言

中国和日本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但到了近代,当中国逐步衰落后,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日本长达五十年的侵华,将中国的一些地区沦为它的殖民地和占领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日本却大肆宣传其侵略的合法性,其中在意识形态上的因素便是以大亚细亚主义为理论依据。本文试探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同时也为其侵略创造辩护的理论。

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亚细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也是日本所推行的“大陆政策”的理论来源。什么是亚细亚主义?“亚细亚”一词,为英文 Asia 之译音,最早见于 1672 年北京刊印的《坤舆图说》。该书为清康熙时,比利时耶稣会教士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所撰,内有“亚细亚,天下一大州”之句,此为“亚细亚”最初之译名。后来“亚细亚”一词流传至日本,成为日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屏副研究员认为,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是在西方列强加剧侵略东方的危机时刻,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有关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由于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历程,它又表现为强调亚洲平等合作的古典亚细亚主义、强调扩张领土的大亚细亚主义以及对亚洲实施侵略的大东亚共荣圈三

种形式。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中,完成了它从“兴亚”到“侵亚”的质变历程。

二、大亚细亚主义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意识形态上准备了条件

大亚细亚主义始于 1882 年的朝鲜“壬午兵变”和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对亚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亚细亚洲要同心协力抵抗西洋人的侵略,必推出一个首领来做盟主。……而这个东亚的首领盟主非我日本莫属。我们就是盟主。”^[1]在当时东亚唯一有少许资格与日本相抗的,只有中国!因此,日本视中国为东亚的主要竞争对手。如果要独霸东亚,就必须打败中国,将中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成为军国扩张主义。福泽谕吉曾表示对中国与朝鲜,日本只是要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使两国效法日本实行文明开化。他认为只是方式的问题,不存在侵略,这是典型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

在东亚各方势力中,日本认为自己真正对手便是俄国。为对付俄国,日本开始建立自己的“主权线”和“利益线”,大亚细亚主义者认为用“未开化”的朝鲜和“半开化”的中国来阻止俄国的势力,这就要求它首先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纳入到自己的版图,这也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还是大亚细亚主义者,他们在价值判断时首先考虑的都是日本国家利益,所以日本民间的亚细亚主义被政府的大陆政策所利用,成为日本侵略的工具。1891 年建立的东邦协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东亚、南亚各地之地理、商况、兵制、殖民、国际形势、历史、统计等。甲午战争时期,该会活动积极。会员有后来的政坛要人与各界名人:犬养毅、原敬、大井宪太郎、陆实、小村寿太郎、冈仓天心、涩泽荣一等。它培养出了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实业家以及亚细亚主义者,其中不乏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制造者。

三、大亚细亚主义反映了日本国内大财阀们的根本要求

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支持者,有一部分是有势力的财阀,他们是彻底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主持者,反对平等的古典亚细亚主义,

并且与军国主义相结合,因为对外的侵略能够满足他们对国外市场的开拓,这就要求进行对外经济扩张。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与财阀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形式,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所谓国家垄断资本是由银行资本(如兴业银行、正金银行等)与产业资本(满铁、东洋拓殖等)相结合的武装资本,具有为军国主义扩张侵略开路的作用。日本侵占中国领土之后,财阀纷纷将其触角伸向中国大陆,如三井财阀在中国投资最大,三井财阀系列的小野田水泥公司在大连开设工厂,东洋棉纺公司经营上海纺织公司,大连油脂公司,浦东造纸厂等。三菱财阀在大连开设大东油脂工业公司,安田财阀在东北开设正隆银行及其他行业等^[2]。

同时,大亚细亚主义也影响着日本中小业主。从日本国内来说,1931 年 4 月,日本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促进了财阀的重化学工业的投资与发展,但中小业主受到打击。面对这种局面,处于日本社会下层团体开成一种势力,冲击着日本的政治结构,并且对日本的对外战略与政策的改变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同时也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

四、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军界影响深远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关东军将校在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制造了爆炸事件。虽然铁路未受到损坏,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便以这个自导自演的事件为借口向中国发难,嫁祸给张学良部队,下令独立守备队、步兵第 29 连队向奉天城内的中国东北边防军营发起进攻。

事件发生一个小时后,驻扎旅顺的石原莞尔中佐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上一份颠倒黑白的报告,本庄繁下令进攻。石原莞尔事先做了准备,关东军部队开出租借地,不到 24 小时,就占领了铁路沿线的战略据点,并做好了继续向南满进发^[3]。

石原莞尔的精心策划,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便是大亚细亚主义理论的实践。石原莞尔不深受军国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代表。

石原莞尔的理论倾向于用“战争景气”带动“内部改造”、“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视

向雷锋同志学习,应当坚持以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适应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与时俱进,紧扣时代主题,再接再厉,用新理念、新思维来认识发展规律,探索档案改革的前进方向,社会的发展呼唤雷锋精神,人民的生活需要雷锋精神,新世纪的档案工作更需要雷锋精神。弘扬雷锋精神,爱恋兰台,心系兰台,使雷锋精神和兰台精神不断发扬光大,让兰台精神在弘扬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丰富。

情况断然实行国内改造”^[42]。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开始制定军事作战计划,不久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如同一个连锁反应装置的开关,一经按动,便引发出一连串的国际反映和国内危机,它们相互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进程。中国马上诉诸国联,要求国际社会督促日本恢复原状。关东军则请求派兵增援。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向东京的参谋本部请战,要求越过鸭绿江进入满洲。9月19日,日本政府依然是消息不通。若槻首相这样向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我手上既没有外务省报告,也没有陆军省报告……我刚刚通过川崎书记官长提醒了他们……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太不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既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了^[54]。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关东军本身深受军国主义及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响,为实现大亚细亚,他们采取主动行动,发动九一八事变,实施对华侵略,继而将大亚细亚主义发展到大东亚共荣圈的阶段。

五、日本经济的供求关系为大亚细亚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亚细亚主义的财阀们,不遗余力地充当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的急先锋,成为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日本始终觊觎中国丰富的物产资源,将中国视为其扩张势力的最大战略目标。日本很清楚“中国铁矿石丰富,煤炭丰富、石油有望,且适宜棉花栽培,羊之饲养等等。总之,其他我国国民经济所必要的,以及实行国防计划所必要的原料资源,几乎都需要从中国获取”^[629]。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1932年6月设立国家垄断资本的“满洲中央银行”,控制整个中国东北的金融,日本掠夺中国东北资源的主要机构“满铁”(1906年6月成立)成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殖民掠夺公司,霸占长达10700公里的中国东北铁路线,大连、旅顺、安东、营口等港湾码头,全由其支配。

不仅进行直接的经济掠夺,还积极协助

军部对中国推行军国主义“移民政策”。由三井、三菱和住友等老财阀操纵的“满洲拓殖股份公司”,制定20年内由日本向中国东北迁移百万户500万人的“移民计划”。其野心在于将中国东北变为军国主义永久的殖民地和侵略全中国乃至东亚的国防基地。“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它是近代日本政治、经济的操纵者,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7]

六、日本用大亚细亚主义为九一八事变辩护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国民书》,说:“深信此次事件,苟经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予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补救。”^[826]

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政府要求,在日内瓦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会上意见很快趋于一致,强烈反对日本的行为。

11月6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报告外务省已经决定放弃只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转向支援熙洽将军及以南满地主阶层为基础建立傀儡政权^[9122]。熙洽是于1911年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投入张作霖麾下。满洲事变后宣布吉林省独立,其后很快投靠满洲傀儡政权。有关满蒙问题,直接与傀儡政权的上层进行协商,不再与张学良或南京政府谈判。币原也向朝鲜新任总督宇垣将军和牧野、西园寺寻求支持,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929]。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起用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针对日本代表的异议,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决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为限从占领区撤出部队。

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际批判高涨,而以报刊、广播、娱乐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先导的舆论则支持关东军,谴责中方和西方。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返回东京,与关东军相呼应,为在满洲新建立的中国政权而奔走呼号时,受到群众的狂热欢迎。

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亚细亚主义是否定民族主义的对外军事扩张正当化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既定事实的认可,大亚细亚主义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对于建立满洲国,大亚细亚主义者作好了充分的准备。1928年11月,“满洲青年联盟”成立,主张建设满洲自治国。他们日本政府能够对中国施加压力,保护他们这些日本中小商人的利益。青年联盟的成员一般都是大亚细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对石原莞尔的影响很大,追求大日本、大亚细亚,在这种理

念的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侵略行为视为合理与正当。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它是在青年联盟的“满洲独立国”的构想理念影响下由关东军一手策划而成的。1933年伪满洲国声明将“东亚联盟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基础。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其理念源于“满洲民族协和和精神”以及“王道主义”、“以日本为先导”的思想。实际上它是由东方精神与日本盟主论混合而成的介于大亚细亚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之间的一种形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利用大亚细亚主义作为处理东亚国际性事实关系正当化的新概念被广泛地使用,九一八事变也正是日本退出国联的原因所在。日本对于退出国联,放弃实现全球主义而专注于东亚有着自己的考虑。第一,它意味着对国联主导的全球主义组织的否定。第二,有别于国家主义并超越国家主义的一种新的国际秩序。

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主张用大亚细亚主义为其辩护,排斥国联及美国的干预。他们以美国的门罗主义与日本的亚细亚门罗主义(也就是大亚细亚主义)进行比较,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此际国联及美国之干预,明明不侵害亚细亚诸国之独立,非欲在亚洲获得新领土。故关于干涉目的及事项,门罗主义与所谓亚细亚门罗主义之间,有重要之差异。后者范围遥广,惟其范围广泛,不得不谓为无限广泛,不得不谓为无根据不正当。”^[1015]

综上所述,大亚细亚主义无论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到处可见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响。它要以把美英白种人从亚洲赶出去为借口,企图霸占中国及全亚洲,大亚细亚主义富有了强烈侵略性质。大亚细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侵略行径制造舆论。这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根本因素。

参考文献

- [1] 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M].岩波书店,1951.
- [2] 《东方杂志》第25卷第15号.
- [3] 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M].青木书店,1991.
- [4] 转引自山田二郎主编.近代日本の扩张と侵略[M].新日本出版社,1997.
- [5]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二)[M].岩波书店,1950.
- [6] 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M].东京大学研究会,1972.
- [7] 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的现代化[J].南开学报,1994(2).
- [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
- [9] 波多野澄雄.满洲事变与“宫中”势力[M].
- [10] 《辟亚细亚门罗主义》,摘自《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七号.